

贯彻十九大精神
抒写新时代华章

洞察现实与新时代史诗

□刘大先

每一个身处于某个时代中的个体，并不一定因为他的亲历性就必然获得了对于时代的清晰认知，这就如同行走在山间道路上的旅客，沿途景色风物目不暇给，却并不能让他全部掌握峰峦叠嶂的全貌。他惟有登上高峰，让眼光像飞鸟一样飘飞远举，方能纵览山河，看清大地的全景。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是一样，只有以思想的洞察力和精神的涵盖力作为支撑，才有可能统摄全局，而不至于陷溺在支离破碎的经验迷障或者游离在偏执的观念之中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史诗般的演进召唤着文学的史诗般书写，而认识新现实、书写新史诗、塑造新人物并非易事，惟有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宏阔深入的分析乃至艰苦卓绝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灵魂交战才可能朝这个理想目标迈进。

新现实：时代的多重褶皱

理解与认识我们时代的新现实，是任何一个试图书写时代者的前提。毫无疑问，现实并非透明的镜子，而是多重褶皱的重叠，它一方面区别于人身经历的片段“真实”，另一方面也不是主观心理的虚构，而是凝聚在书写者与时代的意向性结构与关系之中，因为它的描摹、批判与规划的多重指向性而成为一种文学的意向性现实。

如果从体验与感受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新时代经验到的现实划分为三种。其一是身体现实，这是所谓的直接经验，即个人的眼耳鼻舌肉体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域的所感所知。因为其无可比拟的互动性和切肤性，而成为一切创作的基础。但其优长也是其局限，就是囿于个体化的限度而难以具有超越性。

其二是闻知现实，也即间接经验，来自于每个人所受到的教育、所接受的信息和所服膺的观念。尽管这是一种主观现实，却往往具有比身体经验更为强大的力量，比如文化教育所形成的认识范型、宗教信仰所构成的定见、压倒性的信息流播，它们合力会形成一个人对于社会与时代认识的顽固的前理解话语，要突破这种前见需要从根深蒂固、泥沙俱下的话语之中进行深刻有时候甚至是撕心裂肺的辨析与扬弃。

其三是增强现实，这是我们时代新兴的虚拟经验。如果说身体现现实和闻知现实文学史上是一开始就具有的情形，虚拟现实则是在新媒体技术手段和景观社会语境中的独特现象。所谓增强现实就是文本与符号突入到生活之中，并且让自己成为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虚实相生，真假莫辨，或者说真实与虚假的逻辑在这种鲍德里亚所谓的“超真实”拟像文化中已经消弭了。尤其是在网络遍及日常生活无远弗届的角落之后，现实已经日益转向“后事实”或者说“后真相”的图景。

这三重现实交织在一起，现实融合了。面对个体经验的有限性，碎片化经验与信息的局限性，总体性思维还有无可能，如何才能立体、全面而又深刻地描绘时代的风貌、探明时代精神之所在？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名目之下林林总总的文学探索，无论其形式、手法和风格取向如何，其实最终都指向一个“无边的现实”。如今我们面对的多重现实，文学如果要创造出当代的意向性现实，那么可能需要认清现实的深度模式向平面模式的转化：对应于表象世界的万千呈现形态，精神的内在、灵魂的幽暗与心理的深层，一向是现代文学孜孜以求的“本质”，这在今日依然有效，因为曾经的现实还在；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在这种二元式思维之外，开掘出虚拟现实层面的二元合一、即目会心，所见即所得，表象即本质，那就有待适应于此种现实内容的新形式。

新史诗：从个体到共同体

发明新的书写形式，是新史诗的内在要求。从文学生态而言，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旧有的文学形式依然生发出巨大的能量，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已然来临，这个经过了

现代性洗礼的时代让古典的史诗世界瓦解，人与世界之间的和谐合一状态被打破，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从《伊利亚特》《奥德赛》到《尼伯龙根之歌》《卡勒瓦拉》这些古典史诗或者在浪漫主义时代被重新整合的史诗如今只能作为文学遗产，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如《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更多只是在某个特定区域、特定族群还具有“活的传统”的意味，却无法对当代生活发言了。

当小说成为现代史诗之后，19世纪、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确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具有史诗风格的摹仿与表现形式。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进程中，也曾出现了革命英雄史诗的成功范本，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代中，那种既有的语法失效了，虽然我们依然可以在各种媒体表述中看到对于某个具有宏大野心作品的史诗评价，但无论是新历史主义还是新写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影响下的先锋写作，都往往聚焦于家族命运、个人经历与大历史之间的比照、参合与互动，难以承担起史诗的重负。其根本原因在于，一种个人主义和个体化倾向在写作观念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史诗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共同体的命运。史诗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英雄绝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种类、群、集体的存在。这种集群性的主体重新将现代社会中分裂了的个人与社会通过想象与书写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之中，个人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存在，而总是与悠久的历史、广阔的社区、宏观的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在个体中见出总体，也只有在总体中才能认识个人，它们的命运整合纠结在一起。扩而言之，史诗指向于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时代呼唤着总结过往、瞻望未来的新史诗，其核心在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塑。文学如果要想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就应当承担起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的责任，认识到超越既有文学书写规范的艰难性，在此基础上重新召唤、打造一种关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我们曾经在赵树理、柳青的作品中看到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与实践中创业的艰辛以及社会主义新人的强大主体意识与新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曾经在路遥的小说中看到新时期农民奋发图强的强力意志。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都带有古典主义史诗的色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路径中，有过迂回曲折的成就与教训，留下丰富的书写题材，为新史诗的写作提供了深厚的资源。

以晚近40年来最为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增强为例，经济学家梳理出多次危机，涉及到外资外债的背景和“三农”的应对，都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向“三农”转嫁，城市的产业资本实现“软着陆”。政府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象和外部地缘政治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这才是新时代扣人心弦又惊心动魄的史诗，既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更关系着生活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欢喜哀愁。记录、见证、认识、评价、展望新的时代，需要从个人主义、审美主义和文化主义的偏狭中走出，弘扬文学的公共性、社会性和集体性，是新史诗书写的关键——这并非前者不重要，而是说前者应该以后者作为坚固的支撑。史诗要求的不仅是美，更是力，不仅讲究美学趣味，也要伸张教育认知，不仅要有人文关注和人性讨论，更要有思想辩难和精神提升。

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选登

陈平原编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为阅读/研究王瑶的学术序列又添新丁。全书主要围绕王瑶其人其学展开，但也以透视的方式灌注了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若干重大议题的追问与反思，堪称一部以典型学人为个案的见微知著的“20世纪中国学术史论”。

首先，以王瑶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典型个案”，与他在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的纽带位置密切相关。无论是上承鲁迅、陈寅恪与朱自清等前辈学人的精神气象与思想资源，还是下启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几代学者的学术路向与现实关怀，更不必说他与同侪——无论“清华同学”还是“北大(中文)四老”——之间的互动与交响，都使得王瑶成为后来者在面对与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全局与深度时不容回避的核心对象。这就为一代又一代学人反复阅读/研究王瑶提供了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与后劲。

其次，除去王瑶其人其学的丰富义涵及其之于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意义以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堪称一部“学术史论”还与编者陈平原的着力经营有关。事实上，深具历史感与学术史眼光的王瑶诸弟子在当初撰写追怀文章时便并不止步于追忆与怀念，而是从一开始便为阅读/研究王瑶打上了鲜明的学术烙印。陈平原正是其中十分自觉地将王瑶作为学术史人物来看待与论述的一位。在《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他更是将这一思路与姿态贯穿全书，提出应当让“感情逐渐让位于理性”，使阅读/研究王瑶“与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思考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表彰与怀念，更包括直面危机与教训，或者发潜德之幽光，由此而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他看来，“这样谈论王瑶先生，符合他作为清醒的学者的立场”，也是史家应当具备的品格与责任。《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便是陈平原这一努力的结果。

陈平原为《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确立的基调是“史著凸显，随笔淡出”。全书分为五辑。一、二两辑均为论文，辑一主要讨论王瑶其学，辑二侧重论述王瑶其人。这两辑超过了全书的泰半篇幅，是为全书的主体部分。在辑一中，解志熙综论王瑶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与风格，高恒文考察《中古文学史论》的著述体例与历史意识，张丽华追踪王瑶与“清华学风”的内在关联，孙晓忠勾稽《中国新文学史稿》写作的学术与政治，张梦阳总结王瑶的鲁迅研究的文化追求，姜涛清理与提炼王瑶晚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相关论述，凡此皆属有的放矢的用心之作，基本覆盖了王瑶一生为学的主要方面与方向，不仅每篇均有条例、系统，而且彼此之间也有参照、补充。在辑二中，孙玉石全面评价王瑶为人——“胆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圆而行欲方”，姜涛辨析“一二·九”运动与王瑶学术起点的深层关系，谢泳辑录王瑶1956年山西之行的旧事与佚文《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些问题》，钱理群将王瑶自1952年至“文革”结束期间的“检讨书”引入讨论视野，陈平原展现王瑶晚年“学者”、“师者”与“长者”三重身份的辩证，并且尤其关注“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这一命题的生成，如是研究皆以“知人论世”为原则，均能由“学”及“人”，探究作为“历史中人”的王瑶在具体情境中的进退得失，进而搜集一份20世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辑三系随笔，作者孙玉石、刘增杰、王得后、段宝林、钱理群、吴福辉、赵园、温儒敏与陈平原依次为王瑶在“文革”之前与其后培养的弟子。值得一提的是，孙玉石等人都已不是首次撰文纪念王瑶，此次收录的文章皆系他们在王瑶百年诞辰前后的新作。而彼时距离王瑶去世，已有25年的时光，所以在他们笔下，学术判断的意味已经明显超过情感投射的成分，即便“志言志行”，也不只是为了“立此存照”，更多关注的乃是其中通透的“学术智慧”与“精神魅力”。可以并不夸张地说，王瑶诸弟子在25年间不断同王瑶展开对话与互动，本身即已构成学术史上的一道“风景”：自其表言之，王瑶不断为他们提供学术、思想与精神资源，同时也在此过程中成为“经典”；自其里言之，1980年代以降的学术风云与时代冷暖也熔铸其间，有待有心人的体悟与召唤。

辑三固然精彩，但陈平原在编辑时却有意将其压后，这与他的“史著凸显，随笔淡出”的思路直接相关。如果对比王瑶百年诞辰之际出版的《阅读王瑶》(孙玉石、钱理群编)一书，则陈平原的用心更可得见。《阅读王瑶》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为人但有真性情”收录了王瑶去世以来的若干纪念文章，旨在“怀人”；下辑“治学犹能通古今”收录了同一时期研究王瑶学术的最重要论文，意在“论学”。不难发现，《阅读王瑶》的编辑仍然是“纪念文集”式的，而《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却不同。陈平原希望以此提醒读者：《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是一部“学术史论”，尽管其中的追怀色彩依然浓重。他表示：“本书之兼及怀念与研究，那只是一个过渡，相信下一代学者会有更专业且更深刻的论述。”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辑四为“精神的魅力——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与当年《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人物特稿《“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作者彭苏)。辑五是由王瑶家人提供的两份王瑶在“文革”期间写作的“检讨书”以及王瑶的女儿王超冰据此完成的长篇论文《父亲王瑶：“文革”期间的一个案例》。此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纪念之作，而是完全将“父亲王瑶”作为历史人物加以考察，甚至不乏冷峻的逼视与拷问。这无疑恰与陈平原的“史著凸显，随笔淡出”的论述策略与追求异曲同工。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在凸显王瑶作为学术史人物的面向时，自然也就得出了若干与学界此前阅读/研究王瑶时有所不同的“新见”。举其大端，大略有二。一是对于《中古文学史论》的评价明显高出《中国新文学史稿》等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不仅有陈平原、高恒文与张丽华关于《中古文学史论》的精彩专论，而且在解志熙等人的文章中也都涉及了相关话题，带入的问题意识与打开的问题空间都相当丰富，而对于《中国新文学史稿》等王瑶的现代文学著作的论述则既篇幅有限，也推进不大。二是与此相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视野在《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被明显弱化，几乎只有极少笔墨在致力思考王瑶的“学科史意义”，学界此前在谈论王瑶时作为某种思想前提的学科界限被彻底突破，由“学术史视野”取而代之，当然，这或许也与樊骏、黄修己、温儒敏与高远东等人已就王瑶的学科史贡献做出过大量经典论断而“剩义无多”有关。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还记录了不同代际的阅读/研究者自身学术范式的更替。如果说在王瑶的弟子一辈中，大都认为王瑶的主要张力与核心困境在于学术与政治的歧途的话——这一判断集中体现在与王瑶弟子年龄相仿的夏中文的论述中(参见收录于《阅读王瑶》的夏中文《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读王瑶书》)，更为年轻一代的学人则在尝试重新将学术与政治整合成一种新的整体性的观照视野，所以他们对于王瑶的阐释也就异于前说。不同的学术范式发现了王瑶的不同面向，而丰富并且充满内在紧张的王瑶也反过来提醒他的阅读/研究者：任何学术观，甚至世界观都应当被历史地认识与理解，而真正的学术史必须能够承担历史，同时面向未来继续敞开。

——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读后
□李治洋

关于“第七届(2017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入围项目的公示

“第七届(2017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初评推荐工作自2017年12月6日启动，于2017年12月31日结束。在规定期限内，共收到20位初评委推荐的论文60篇。评奖办公室在收到推荐结果后进行了认真审核和筛选，最终确定20篇优秀论文入围终评。现将入围篇目公示如下(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列)：

1.付祥喜:《从融合到分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之关系考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2.朱羽:《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物”与“心”——关于〈艳阳天〉的一种读法》，《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3.刘旭:《文学莫言与现实莫言》，《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4.李丹:《中国当代文学的“征求意见本”现象——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的长篇小说为中心》，《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5.李娜:《试析1950—60年代台湾青年的“虚无”，重新理解“现代主义与左翼”——以陈映真、王尚义为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6期

6.李广益:《中国转向外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7.杨辉:《贾平凹与“大文学史”》，《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

8.张欢:《“事实性”的利用与“真实性”的表达——解

读(小团圆)兼论张爱玲》，《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

9.张丽军:《论鲁迅对乡土中国文化转型的思想认知及其形象谱系》，《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

10.张洁宇:《论早期中国新诗的本土化探索及其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9期

11.张晓琴:《“独药师”的文学之道——论张炜的意义》，《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12.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论路遥的“改革”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

13.孟庆澍:《“反成长”、罪的观念与个人主义——重读〈骆驼祥子〉》，《文艺研究》2017年第3期

14.项静:《历史写作与一代人的心态镜像——评张悦然的〈茧〉》，《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15.祝宇红:《“化俗”之超克——鲁迅(起死)的叙事渊源与主旨辨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2期

16.徐刚:《历史类型、现实模式与未来图景——当代乡村叙事的三重维度》，《上海文学》2017年第10期

17.徐秀明:《文化冲突与叙事错位——由〈长恨歌〉谈王安忆的小说美学及其创作转向》，《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

18.黄德海:《作为竞争的虚构与非虚构》，《东吴学术》2017年第2期

19.韩琛:《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与反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

20.薛祖清:《论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情缘与“文艺复兴”梦想建构——以译介〈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本次公示日期为2018年1月5日—12日。其中若有不符合评选条件或违反学术规范的作品，欢迎在公示期内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奖办公室反映。

联系人:宋嵩
联系电话:010-57311895

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奖办公室

2018年1月5日

附:第七届(2017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参评条件

(一)参评对象为国内(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海外45周岁(1972年1月1日以后出生)以下的青年学者。

(二)本次推荐论文的范围是2017年1月1日—12月31日在中国内地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单篇论文。

(三)文章字数应不少于8000字。